

三语初期迁移考察：普通话时体句末助词的 二语及三语习得对比

郭艳瑜、袁博平

摘要

本论文通过对比普通话二语（英语母语）和三语（英语母语 - 粤语二语）初学者对时体句末助词“了”、“呢”和“来着”的习得，探讨三语初级阶段的迁移来源。我们采用“图句匹配”实验来测试三个现有的三语模型。实验结果显示，三语初学者比二语初学者能更正确地掌握“了”的语义。这表明迁移来自于粤语，从而否定了“一语迁移假说”（Jin, 2009; Na Ranong & Leung, 2009）。“了”和“来着”的习得结果呈现出不对称性。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来着”的习得受到了音节错配、语言透明度及词频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呢”的实验结果表明，之前所学语言仅仅在句法上与目标语都采用同一形式时，语言类型上的近似性并不总是能对习得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三语初级阶段 迁移来源 句末助词 汉语普通话
粤语 英语

郭艳瑜，剑桥大学，联络电邮：yg298@cam.ac.uk。

袁博平，剑桥大学，联络电邮：by10001@cam.ac.uk。

* 本研究是由英国人文研究资助委员会（AHRC）资助，在此我们表示感谢。本研究是 Multilingualism: Empowering Individuals, Transforming Societies（under the Open World Research Initiative）研究项目里的一个子课题。

引言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使用多种语言的现象已成为主流。多语制及其发展开始吸引越来越多语言学研究的关注。非母语语言习得在传统上常被归入二语习得范围讨论，并不对单语或者双语背景学习者进行区分。但现在，诸多研究指出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在迁移来源和后期发展上都存在差异。三语习得具体是指已经习得或正继续习得两种语言的人习得另一门非母语语言，前两门语言可以是同时习得也可能是先后习得（Cenoz, 2013）。形式句法框架下的三语或多语习得近年已有显著发展，也趋于纳入更多的语言组合。现有三语模型着重探讨三语习得中尤其是三语初级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二语和三语普通话句法的初级阶段来探究三语迁移来源。

一、有关迁移来源选择的三语模型

学界普遍认为三语习得初期存在迁移现象，即第三语言受到已习得的前两种语言的影响，并且三种语言会产生交互影响（参看 Puig-Mayenco et al. (2018) 的三语研究综述）。问题重点在于究竟哪一门语言是迁移的主要来源。现有三语模型致力于讨论一语、二语还是这两种语言都会在初期迁移中起主导作用，以及考察迁移中的决定性因素为何。本文将测试其中的三个主要的三语假说：一语因素假说（the L1 Factor Hypothesis : Jin, 2009; Na Ranong & Leung, 2009; Hermas, 2010）、二语地位因素假说（the L2 Status Factor Hypothesis : Bardel & Falk, 2007, 2012; Falk & Bardel, 2011）和语言类型优先模型（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 Rothman, 2011, 2015）。

1.1 一语因素假说

由于一语是最强、最稳定也最具活力的语言，可能的情况之一是一语为三语习得初期迁移的主要来源。一些语言学家提供了一语起到决定性作用且影响超过二语的证例（Jin, 2009; Na Ranong & Leung, 2009; Hermas, 2010, 2015; Garcia-Mayo, 2012; Mollaie et al., 2016），他

们的主要论点被总结为“一语因素假说”。

诸多主张“一语迁移”的研究中, Jin (2009) 及 Na Ranong & Leung (2009) 讨论“空宾语”现象, 习得中也涉及汉语普通话。Jin (2009) 比较一语普通话 - 二语英语 - 三语挪威语学习者对英语和挪威语中的主句空宾语和从句空宾语的语法判断。汉语允许空宾语但英语和挪威语不允许。由于汉语母语者在判定二语英语空宾语中的准确率高于在三语挪威语平行实验中的准确率 (72% vs. 57%), 作者指出一语汉语的影响超过了二语英语。在 Na Ranong & Leung (2009) 的研究中, 汉语普通话是目标语言。他们对比一语泰语 - 二语英语 - 三语汉语学习者和一语英语 - 二语汉语学习者对汉语空宾语的习得。这两组被试的普通话水平均为初级。从类型学上看, 泰语比英语更接近汉语。汉语和泰语都允许空宾语而英语不允许。实验结果显示, 泰语母语者在区分空宾语和显性宾语的细微差别时比英语母语者更接近于汉语母语者。作者认为这一结果可看做三语习得初期一语起主要作用的证据。

这一假说中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首先, 该假说预测一语为三语初期迁移来源, 但缺乏证明一语起决定性作用时完全排除二语影响的证据。其次, 一些研究实验证据来自于高水平学习者。存留于高级阶段的一语影响不足以代表初级阶段的情况。更重要的是, 二语水平是必须控制的重要变量并且会直接影响数据解读。如果被试没有完全习得二语中相关结构, 在三语中则无法观察到二语影响, 从而容易得到一语起决定作用的结论。

1.2 二语地位因素假说

不同于一语因素假说, 一些学者从心理和认知的角度提出了二语地位因素假说。基于表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的区分 (Paradis, 2004; Ullman, 2001), 这些学者认为二语和三语都储存在表述性记忆中而一语则储存在程序性记忆中, 由此, 迁移至少在习得初期应该发生在储存于相同记忆系统的两种语言之间 (Bardel & Falk, 2012)。

该假说最先由 Bardel & Falk (2007) 提出和检验。他们在研究中比较了两组分别学习瑞典语和荷兰语作为第三语的被试。瑞典语和荷兰语中否定词的位置和限定动词要被提升到主句第二位置 (V2 结构)。一组被试 (A 组) 的一语有 V2 结构, 二语没有 V2; 另一组 (B 组) 的一语没有 V2 结构而二语有 V2。两组的数据之间有显性差距, 二语有 V2 结构的 B 组比 A 组表现得更好, 这被认为是归因于来自二语的迁移。Bardel & Falk (2012) 关于三语德语的习得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假说。

这个模型在考察隐性一语知识和显性二语知识区分不明确的情况下可能会失去效力, 例如学习者在习得一语时受到大量元语言训练, 部分一语句法知识也储存在表述性记忆中。此外, 测试手段也会影响实验结果。不同的测试手段会测出不同类型的知识。不计时的句法判断题和填空题等离线测试手段一般用于测量显性知识, 而自步速阅读和眼动跟踪等在线手段一般用于测试隐性知识。在线实验所得的三语加工数据较难用于支持二语显性知识的迁移作用。

1.3 语言类型优先模型

对应 Schwartz & Sprouse (1996) 的“完全迁移 / 完全可及”二语习得模型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Rothman(2010, 2011, 2015) 提出了语言类型优先模型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简称 TPM), 认为在三语或者多语习得初期, 之前习得的语言句法知识都是可利用的, 并且其中一门语言会整体迁移到三语中。迁移受到语法分析器 (a linguistic parser) 的管控, 会根据一些语言学线索在之前习得的语言中挑选类型结构最相似的语言作为迁移来源。Rothman(2015) 提出了一个关于语言线索的蕴含层级来指导语法分析: 词库→语音→形态→句法。在语言近似度的感知判断完成后, 类型结构更接近的语言的语法就会整体迁移到三语中。

Rothman & Cabrelli (2010) 提供了该模型的有力证据。他们测试一语英语 - 二语西班牙语 - 三语意大利语学习者和一语英语 - 二语西班牙

牙语 - 三语法语学习者对空主语参数的习得。西班牙语在类型学上比英语更接近语这两种第三语言。但针对要测试的目标结构，法语和英语都不允许空主语。结果显示，学习者将三语法语看作允许空主语的语言，这表明迁移来源于类型结构近似的西班牙语。

一些学者提供了证据证明类型相近的影响不能凌驾于二语影响之上，同时也质疑“（心理）类型相似性”这一概念（Falk & Bardel, 2011; Kulundary & Gabriele, 2012）。Rothman 的团队强调，在他们的模型中，语言类型是指底层句法结构的近似性而非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谱系相近。类型迁移是由学习者大脑内部的语法分析器指引和预测的。

以上是对三个模型的简要分析。总的来说，三语习得中跨语言影响来源被推测为一语、二语或者二者皆有可能。有三个重要因素被重点纳入讨论：1) 语言习得顺序；2) 心理认知的显著性；和 3) 类型学特征。这些模型中的具体预测需要实证研究来测试，尤其需要更多考察非印欧语言的研究加入讨论。

二、普通话中句末助词“了”、“呢”、“来着”及其英粤对应成分

句末助词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SFPs) 是在句末指示时体意义、标志句子类别、以及表达说话人情感态度的助词。与英语不同，汉语普通话和粤语都使用句末助词 (Li & Thompson, 1989; Matthews & Yip, 1994)，从而粤语在语言类型结构上比英语更靠近普通话。粤语句末助词系统比普通话丰富。如果按形式划分，汉语中有 6-7 个句末助词 (朱德熙, 1982)。粤语语气词数量较多，基于不同标准，可分出 20 到 90 个不等 (参见 Matthews & Yip, 1994; 梁仲森, 2005 等)。例 (1) 和例 (2) 分别说明了普通话和粤语中句末助词的分布和功能。例 (1) 中的普通话助词“了”和 (2) 中的粤语助词 *laa3* 功能相同，表达与现时相关的状态改变。例 (1) 中第二个普通话助词“啊”和例二中的粤语助词 *wo3* 有核查预设的功能。不同类型的句末助词可以在同一句

中共现。

(1) 你 现在 要 出门 了 啊?

Nǐ xiànzài yào chūmén le a? [普通话]

you now want go out SFP SFP

“You are going out now, aren’t you?”

(2) Nei5 ji4-gaa1 jiu3 heoi3-gaa1 laa3 wo3? [粤语, Chan (2008)]

you now want go out SFP SFP

“You are going out now, aren’t you?”

有很多研究探讨普通话句末助词的功能 (Li & Thompson, 1981; 朱德熙, 1982; Paul, 2015)。基于句末助词的诸多功能及可共现特征, 句末助词被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表达时体意义; 第二类标志祈使句和疑问句; 第三类表感叹等态度语气 (参见朱德熙, 1982)。采用 Rizzi (1997, 2004) “分裂 CP” 的理论分析, Paul (2015) 提出汉语中的句末助词是 CP 的中心语, 处于中心语后置位置。不同类型的句末助词处在分裂 CP 下的不同投射中。第一类助词处在最低的投射中表达时体相关的意义, 对应 Rizzi 的 FiniteP。“时”和“体”都是有关时间概念的语法范畴。“时”是关于事件所处时间位置的语法范畴, 即事件何时发生 (如现在时、过去时), 而“体”则标示事件在时间轴上如何呈现, 即是否包括事件终点 (如进行体、完结体) (Comrie, 1976)。这一类句末助词有三个: “了”、“呢”和“来着”, 参见例句 (3) - (5)。

(3) 外面 下 雨 了。

Wàimiàn xià yǔ le.

outside fall rain SFP

“It has started to rain outside.” (It didn’t rain before.)

(4) 外面 下 雨 呢。

Wàimiàn xià yǔ ne.

outside fall rain SFP

“It is raining outside.” (It was raining before.)

(5) 外面 下 雨 来着。

Wàimiàn xià yǔ lǎizhe.

outside rain fall SFP

“It’s just rained outside.” (It has stopped already.)

2.1 句末助词“了”

汉语学界对“了”的功能用法有诸多讨论。我们赞成 Li & Thompson 对“了”的分析，认为“了”有两个重要功能：[状态改变]和[现时相关]。“状态改变”是指“了”介绍了一个新情况，“现时相关”是指“了”能把事件与说话时间相关联。如果句中没有其他显性时间成分，“了”的语义就是指示一个和现时相关的状态。粤语中，句末助词 *laa3* 的功能和“了”基本一致，也是指示之前状态或事件的变化和现时相关性 (Kwok, 1984 ; Fung, 2000 ; Matthews & Yip, 1994) , 见例 (6)。

(6) lok6 jyu5 laa3. (Fung, 2000)

fall rain SFP

“(Look), it’s raining now!”

英语中没有句末助词，也没有和“了”直接对应的成分。虽然[状态改变]义在英语中没有形态化，但[现时相关]义在英语中可以通过现在完成时表达。现在完成时是现在时和一个过去时间的混合性时体成分，强调该过去时间的现时关联。例如在“*I have lived in London for years*”中，“*live in London*”的状态就一直延续到现在说话时间。

2.2 句末助词“来着”

“来着”一般用在普通话口语中，一般判定事件发生在较近的过去（即“近过去”义），常常和“刚才”等时间副词共现（宋玉柱，1981 ; Paul, 2015）。“近过去”是根据说话人的主观感知判断。时间的远近义可能因为显性时间词的出现而取消，如例 (7)，从而“来着”的功能简化为对过去事件的判定。另外，“来着”不能与有界事件 (telic events) 共现，如例 (8)。

(7) 六十 年代 他 住 北京 来着。

Liùshí niándài tā zhù běijīng lái zhe.

sixty time s/he live Beijing SFP

“S/he used to live in Beijing in the 1960s.”

(8) * 他 做 一 道 菜 来着。

*Tā zuò yí dào cài lái zhe.

s/he make one CL dish SFP

“S/he made a dish.”

粤语中, *lei4* 是“来着”的对应句末助词¹ (Sybesma, 2004; Tang, 2015; 张洪年, 2018), 如例 (9)。 *Lei4* 标示一个近过去事件, 和有界事件也不能共现。在英语中, 过去事件由后缀 “-ed” 表示, 没有时间远近的隐含义。

(9) Ngo5 yam2 ga3fe1 lei4. (张洪年, 2018)

I drink coffee SFP

“I drank coffee (just now).”

2.3 句末助词“呢”

普通话时体语气助词“呢”的主要功能是指示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件 (朱德熙, 1982), 该语义可总结为 [进行体] 特征, 见例 (10)。“呢”和进行体标记“在”都能表示事件进行, 也可以在同句中 共现。二者的不同点在于, “呢”多了一层“提起听话人注意”的功能, 而“在”是纯粹的进行义描述, 可对比例 (10) 和 (11)。

(10) 他 吃 饭 呢。

Tā chī fàn ne.

s/he eat rice SFP

“S/he is eating.”

¹ 根据 Tang (2015) 和张洪年 (2018), 粤语句末助词 *lei4* 至少有三个主要功能: 指示近过去事件、标记祈使句和表达事件判定。

(11) 他 在 吃 饭。

Tā zài chī fàn.

s/he ASP eat rice

“S/he is eating.”

粤语和英语都没有“呢”的对应句末助词成分。这两种语言都使用体标记来表达进行义：粤语是 *-gan2*，见例 (12)；英语是 *be + V-ing*，例如 “*she is eating*”。

(12) Keoi5 sik6 gan2 faan6.

s/he eat ASP rice

“S/he is eating.”

下面的表 1 总结了普通话“了”、“呢”和“来着”的语义功能及其在粤语和英语中的对应标记。“了”和“来着”在粤语中有对应的句末助词且语义相同，而在英语中的对应语法形式和语义特征都存在差别。由此，粤语比英语在结构上更接近普通话。但是对于“呢”而言，粤语和英语处于同一情况：都分别用单独的体标记来表示进行义。

表 1. 普通话体标记及其英粤对应成分

普通话	粤语	英语
句末助词：了 [现时相关] [状态改变]	句末助词： <i>laa3</i> [现时相关] [状态改变]	现在完成体标记： <i>have + done</i> [现时相关]
句末助词：来着 [近过去]	句末助词： <i>lei4</i> [近过去]	过去时标记： <i>-ed</i> [过去时]
句末助词：呢 [进行体] [提起注意]	体标记： <i>-gan2</i> [进行体]	体标记： <i>be + V-ing</i> [进行体]

三、研究问题及设计

本研究通过考察英语母语和英粤双语学习者对普通话时体句末助词“了”、“呢”和“来着”的习得，来探讨三语习得初期的迁移来源问题。基于现有三语模型的预测和对这三个句末助词的句法语义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个主要的研究问题：

问题一：由于“了”和“来着”在粤语中都有对应的句末助词，这些粤语对应成分的功能和意义是否会迁移到三语普通话的初级阶段，并起到促进作用？

问题二：由于“呢”在英语和粤语中没有对应句末助词，粤语和普通话在句法结构类型上的近似性是否会帮助习得？

共有 81 名被试参与本实验。控制组由 28 名住在中国的普通话母语者组成。两个学习者组分别是：一语英语 - 二语普通话初学者和一语英语 - 二语粤语 - 三语普通话初学者。每个入选的学习者都做了普通话水平测验（测试题改编自 HSK1-6 级试题）且得分低于 16（总分 40）。所有的三语学习者都在语言背景问卷中标明其粤语能力到达高级以上水平²。普通话水平测验结果显示母语者和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2, 78) = 755.23, p < .001$)，但是二语和三语学习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p = 0.85$)，这表明他们的普通话处于同一水平。

表 2. 被试情况

类别	语言组	人数	水平测试得分（总分 =40）
二语	L1 英语 - L2 普通话	23	9.1 (SD: 4.8) (范围: 2-16)
三语	L1 英语 - L2 粤语 - L3 普通话	30	8.6 (SD: 3.6) (范围: 3-16)
控制组	普通话母语	28	39.1 (SD: 0.87) (范围: 35.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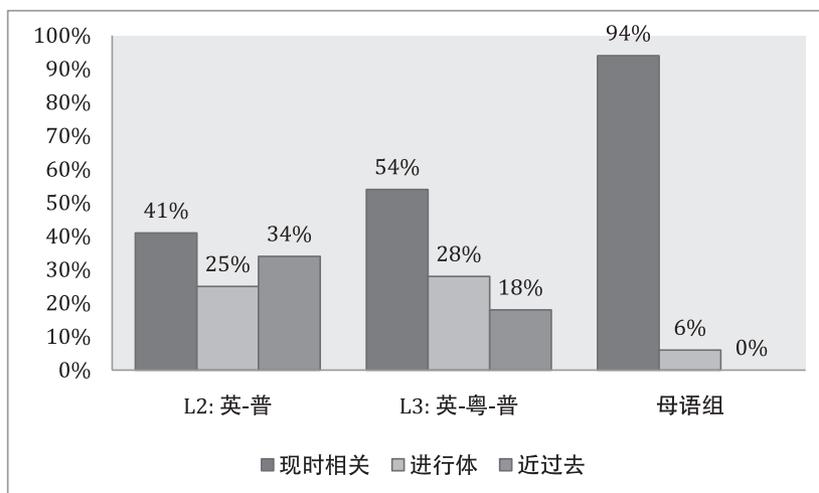
我们采用“图句匹配”实验来考察被试是否能区分“了”、“呢”和“来着”的时体意义。在实验中，被试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也同时听到）一个普通话句子，以及两套图片。被试需要判断哪一套图片能正确表达句子的语义。如果不明白句子的含义，可以选择“不知道”。每个句末助词有六个测试句（示例参见附录）。含有目标助词的测试题占总题数的一半。

2 所有被试都需要在测试前填写一个语言背景问卷。我们根据被试自填信息进行筛选。合格被试的粤语水平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粤语水平自我评级（听、说、读）在“高级”及以上；2. 在家庭/社交环境中频繁使用粤语。

四、研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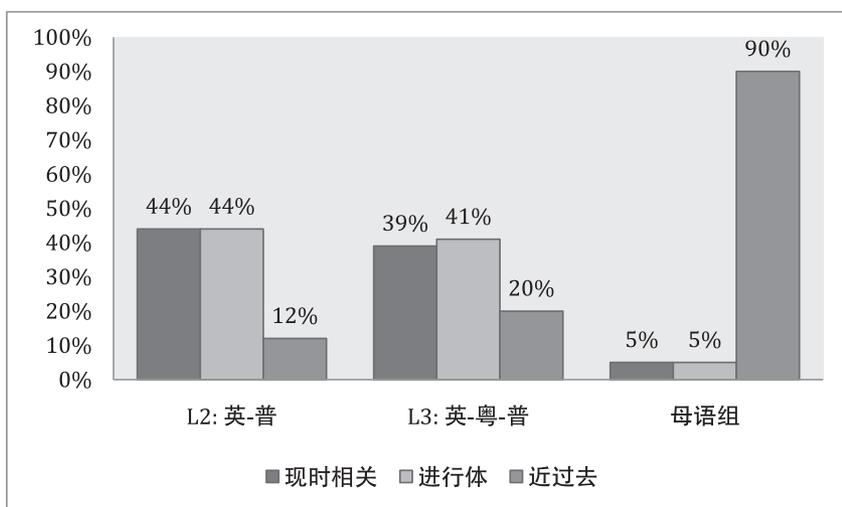
被试的选择结果首先通过图表来呈现。我们使用卡方检验 (*chi-squared nonparametric tests*) 来比较不同被试组的选择模式, 不显著 *P* 值表示被试选择模式相似。除此之外, 各被试组的正确率也会通过方差分析来进行比较。

图 1. 被试组对“了”的语义解读结果



如图 1 展示, 普通话母语者倾向于把“了”看作一个表[现时相关]义的助词(正确选项占 94%)。统计分析显示, 二语和三语学习者的模式和母语者不同 ($\chi^2(4, N = 392) = 59.1, p < .001, Cramer's V = .275$)。对正确率的方差分析反映出明显的组别效应 ($p < .001$)。三语初学者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二语初学者 ($p = .047$), 这表示三语组比二语组对“了”的理解更为准确。

图 2. 被试组对“来着”的语义解读结果



从图 2 可以看出二语组和三语组对“来着”的语义理解接近，但与母语组完全不同。学习者倾向于把“来着”看作一个 [现时相关] 或者 [进行体] 标记，而非 [近过去] 标记。统计分析表明，这三组对“来着”的语义理解完全不同 ($\chi^2(4, N = 366) = 91.6, p < .001, Cramer's V = .354$)。三语组和二语组的正确率差值不显著 ($p = .189$)。

图 3. 被试组对“呢”的语义解读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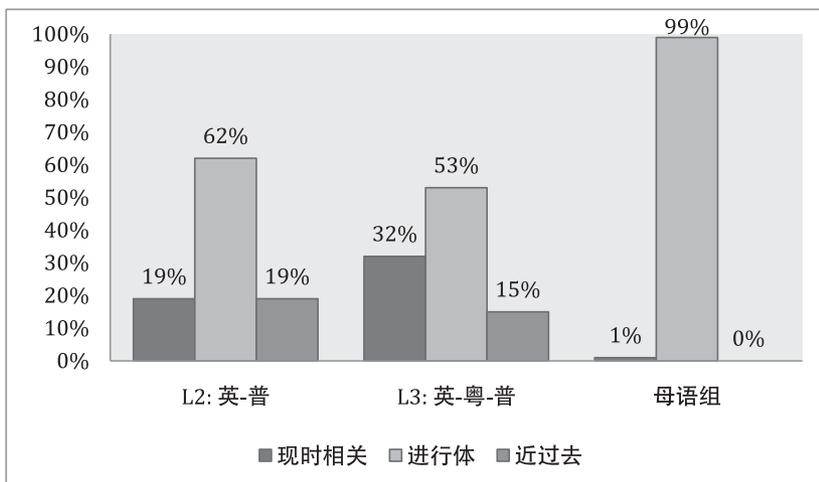


图 3 显示三组被试都倾向于把“呢”解读为 [进行体] 标记, 正确语义选项的比率都超过 50%。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三组的语义解读模式互不相同 ($\chi^2(4, N = 372) = 59.6, p < .001, Cramer's V = .256$)。虽然方差检验找到了显著的组别效应 ($p = .271$), 但两个学习组的正确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别 ($p = .271$)。

五、讨论

以上实验数据展示出二语和三语学习者在习得“了”、“呢”和“来着”中的不同模式。主要发现有以下三点: 1) 三语学习者比二语学习者在习得“了”的语义上更为准确; 2) 二语组和三语组都不能正确习得“来着”; 3) 两个学习者组能基本掌握“呢”的语义且表现出相似模式。把研究结果和所提出的问题相联系, 我们将从三语初期的迁移来源、影响迁移的额外因素以及语言类型相似性三个角度来展开讨论。

5.1 三语初期迁移来源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探究三语初级阶段的迁移来源以及测试现有的相关模型。学习者对“了”的习得数据显示, 虽然三语初学者组对“了”的语义理解和母语者有显著差距, 但比二语初学者组更为准确。正如我们所知, 二语和三语组的唯一区别在于语言背景: 三语组在学习普通话前习得了粤语。粤语在语言结构类型上更近似于普通话。“了”在粤语中有直接对应的句末助词 *laa3*, 已经习得粤语句法的学习者应该会比较容易地习得“了”。实验结果证实粤语的确起到了促进作用, 粤语的句末助词 *laa3* 的语义和用法被迁移到了三语普通话中, 帮助了习得。

该实验结果否定了“一语因素假说”的假设, 三语初期迁移并非总是来自于一语。英语是本研究两组学习者被试组的一语。如果英语在初期迁移中起决定作用, 这两组的数据之间应该没有显著差异。然而, 我们的结果显示习得了粤语句法的三语组比二语组表现得更像母语者, 这是否定迁移来源于一语的有力证据。但是, 我们并不能进

一步地区分余下两个模型，即“二语迁移模型”和“语言类型优先模型”。语言类型近似性和语言习得顺序两个因素混杂在本实验中。粤语既是语言类型结构近似的语言又是三语组的第二语言。迁移被证实为来自于粤语支持了这两个模型，但不能进一步明确最重要影响因素是结构类型还是习得顺序。

5.2 “了”和“来着”的不对称习得结果

“了”和“来着”在粤语中都有对应的句末助词，分别是 *laa3* 和 *lei4*。如果迁移来自粤语的话，我们可以预测这两个粤语助词的语义功能都会迁移到三语普通话中，帮助“了”和“来着”的习得。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出两个助词的习得结果呈现不对称性。三语组比二语组在“了”上表现得要好，但在“来着”上却和二语组表现基本一致。两组都倾向于认为“来着”的语义是[现时相关]或者[进行体]，而不是[近过去]。这表示粤语的 *lei4* 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和 *laa3* 的迁移影响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有可能归结于两点：1) 语音和语义的干扰；2) 三语输入中的词频影响。

首先，“来着”是普通话中唯一一个双音节的句末助词，但它的粤语对应成分 *lei4* 是单音节且功能众多。另外，“来着”的语义透明度较低。“来”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实义动词，而“着”一般作为持续体标记使用。“来着”的[近过去]语义很难从组成成分中直接推出。因此，即使学习者已经习得了粤语的 *lei4*，但是受到语音和字面语义的干扰，很难在短时间内把 *lei4* 和“来着”相联系。

另外，更重要的是，“来着”在普通话中只用于口语且使用频率极低。我们考察了北大 CCL 语料库，找到了约 6 万例句末“了”，约 3000 例“呢”和约 100 例“来着”。普通话学习者很难有足够的输入来发现和学会“来着”的用法。即使粤语中有“来着”的直接对应成分，极低的使用频率也会影响学习者的语言迁移。

5.3 语言类型近似性在三语习得中的影响

在三个句末助词中，“呢”是唯一在粤语中没有对应成分的助词。粤语和英语都使用体标记来表达[进行体]意义。在二语和三语数据结果中，“呢”的语义习得正确率比其他两个助词要高，说明“呢”不是习得的困难点所在。并且，二语和三语组在“呢”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

“呢”的习得情况在前人文献中没有深入探讨。英语和粤语虽然在整体语言类型结构上和普通话的距离不同，但是在“呢”的对应成分上情况相同。此处值得探究语言类型结构的整体相近是否能促进三语习得。具体来说就是，已经掌握粤语这一使用句末助词的语言的人是否在习得普通话的新句末助词时会更快更有优势，即使这个目标语义在粤语中并不是由句末助词来表达的。我们的实验结果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已掌握粤语的三语组并没有明显好于二语组。这表明整体类型结构相似并不总能帮助习得，促进作用可能只发生在目标语和类型相近的语言都用同一类语法形式表达目标特征的情况下。正如 Puig-Mayenco et al. (2018) 指出，在整体迁移框架下，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形义错配，从而迁移不可能总是起促进作用。我们赞同这一说法，但是认为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哪一种形义错配会对迁移产生影响应该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讨论。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考察二语和三语初学者对普通话时体句末助词“了”、“呢”和“来着”的习得，探讨三语习得在初级阶段的迁移来源。我们测试了三个现有的三语模型，讨论迁移是否受到语言习得顺序、心理认知地位以及语言类型结构近似度影响。

“了”的实验结果否定了主张迁移总是来自于一语的“一语因素假说”。有粤语背景的三语组比二语组对“了”的时体意义掌握更为准确。“了”在粤语中的对应词，句末助词 *laa3* 的语义迁移到了三语组的初始阶段，帮助了“了”的习得。这一结果支持了“二语地位因素

假说”和“语言类型优先假说”，但我们并无法一步区分测试这两个假说，因为粤语在本研究设计中既是三语组的第二语言又是与目标语普通话在类型结构上更为接近的语言。

虽然“了”和“来着”在粤语中都有直接对应成分，但二者的习得结果却呈现出不对称性。“来着”对于二语组和三语组来说都是习得难点，而且“来着”在粤语中的对应成分 *lei4* 并没有对习得起到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迁移是受到了“来着”的使用频率以及语音语义错配的影响。“来着”只用于普通话口语，而且使用频率极低。学习者很难在极少量的输入中发现双音节助词“来着”的语义并将粤语 *lei4* 和“来着”相联系，从而成功完成迁移。

“呢”的习得考察了一个特殊的习得情景：两种已习得的语言和目标语的整体类型近似度不同但对目标特征的表现方式相同。英语和粤语都不使用句末助词表达进行体意义，但粤语在句法类型结构上更接近于普通话，都是使用句末助词的语言。结果显示二语组和三语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这表明整体语言的句法类型结构相似并不总是对三语习得起到促进作用。

本研究虽然通过引入新的语言组配测试了现有三语模型，但也还存在很多尚待考察的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区分和测试“二语地位因素假说”和“语言类型优先假说”。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希望能通过实现“镜像设计”（a mirror-image design）来进一步讨论三语从初级阶段到后期发展的诸多具体问题。

参考文献

- 梁仲森 (2005) 《当代香港粤语语助词的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 宋玉柱 (1981) 关于时间助词“的”和“来着”，《中国语文》，第4期，271-276。
- 张洪年 (2018) 缘自何来：早期粤语中“嚟”的来去踪迹，《中国语文通讯》，第97卷，第1期，17-39。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Bardel, C., Falk, Y. (2007). The rol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ase of Germanic syntax.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3, 459-484.
- Bardel, C., Falk, Y. (2012). Behind the L2 status factor: A neurolinguistic framework for L3 research. In Cabrelli Amaro, J., Rothman, J. (eds.).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ulthood*, 61-7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enoz, J. (2013). The influence of bilingualism o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cus on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Teaching*, 46(1), 71-86.
- Chan, S. M. (2008). *The Acquisition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by Native Mandarin Speaker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ster thesis.
- Comrie, B.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lk, Y. & Bardel, C. 2011. Object pronouns in German L3 syntax: Evidence for the L2 status factor.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7(1): 59-82.
- Fung, S. Y.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Garcia Mayo, M. del P. (2012).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3 acqui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2(1), 129-146.
- Hermas, A. (2010). Language acquisition as computational resetting: verb movement in L3 initial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7(4): 202-224.
- Hermas, A. (2015).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relative complementizer phrase in third-language English: A feature re-assembly accou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9(5): 587-607.
- Jin, F. (2009).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Norwegian Objects: Interlanguage Transfer or L1 Influence?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Kwok, H.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 Kulundary, V. and Gabriele, A. (2012). Examining the role of syntactic development in the L2 on the acquisition of an L3: a look at relative clauses. In J. Cabrelli-Amaro, S. Flynn, and J. Rothman (eds.).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ulthood*, 195-22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i, C. & Thompson, S. (1989).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thews, S., & Yip, V.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Mollaie, Azam & Jabbari, Ali & Rezaie, Mohammad. (2016). The Acquisition of French (L3) Wh-question by Persian (L1) Learners of English (L2) as a Foreign Language: Optima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6(7).
- Na Ranong, S. and Leung, Y-KI. (2009). Null objects in L1 Thai-L2 English-L3 Chinese: An empirical take on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Leung Y-KI (ed.)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162-191.
- Paradis, M. (2004). *A neurolinguistic theory of bilinguali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aul, W. (2015).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yntax*.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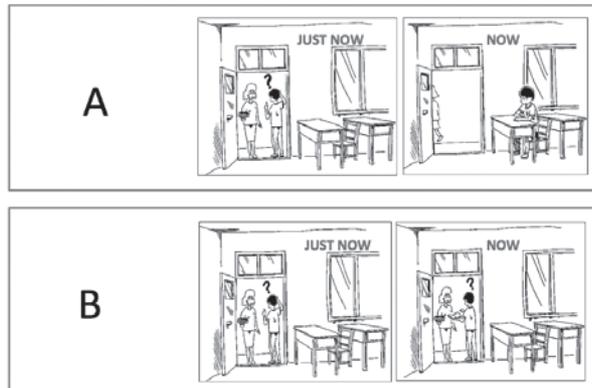
- Puig-Mayenco, E., González Alonso, J., & Rothman, J.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ransfer studies in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34.
- Rizzi, L.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Elements of Grammar*, Liliane Haegeman (ed.). Dordrecht: Kluwer, 281–337.
- Rizzi, L. (2004).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Adriana Belletti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4–131.
- Rothman, J. (2010). On the typological economy of syntactic transfer: Word order and relative clause high/low attachment preference in L3 Brazilian Portugue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IRAL)* 48: 245–273.
- Rothman, J. (2011). L3 syntactic transfer selectivity and typological determinacy: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7, 107–127.
- Rothman, J. (2015).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for the typological primacy model of third language (L3) transfer: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timing of acquisition and proficiency in the previous languages.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8(2), 179–190.
- Rothman, J. & Cabrelli Amaro, J. (2010). What variables condition syntactic transfer? A look at the L3 initial state.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6(2), 189–218.
- Schwartz, B. D., Sprouse, R. (1996). L2 cognitive states and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hypothesi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2(1), 40–72.
- Sybesma, R. (2004). Exploring Cantonese tense. In Leonie Cornips & Jenny Doetjes (Ed.).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200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69-180.
- Tang, S.W. (2015). *Lectures on Cantonese Grammar*. Hong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Ullman, M. (2001). The neural basis of lexicon and grammar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The declarative/procedural model.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4(1), 105–122.

附录：图句匹配样题

(1) “了” 测试句：外面下雨了。



(2) “来着” 测试句：他问老师问题来着。



(3) “呢” 测试句：他听音乐呢。



Transfer at L3 Initial Stages: Comparing Mandarin Temporal-Aspectual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in L2 and L3 Grammars

GUO, Yanyu YUAN, Bopi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L3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temporal-aspectual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SFPs) *le*, *ne* and *láizhe* by two groups of beginner-level learners (23 L1 English-L2 Mandarin learners and 30 L1 English-L2 Cantonese - L3 Mandarin learners). Both Mandarin and Cantonese are SFP languages while English is not. Aiming to shed light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source of transfer at L3 initial stages, we test predictions of three different L3 models by employing a sentence-picture matching task to elicit the learne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arget Mandarin partic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3 group was more accurate on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le* than the L2 group due to the help from the equivalent L2 Cantonese SFP, which rejects the prediction of the L1 factor hypothesis (e.g. Jin, 2009; Na Ranong & Leung, 2009) that transfer is always from the L1. Moreover, an acquisition asymmetry observed between *le* and *láizhe* suggests that additional factors such as syllabic mismatches,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word frequency can affect the initial transfer.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on the SFP *ne* indicate that typological proximity does not always facilitate L3A at the initial stage, if the previously learned languages are similar in the instantiation of the target property.

Keywords: L3 initial stages, transfer sourc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Mandarin, Cantonese, English

GUO, Yanyu,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YUAN, Boping,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